

人工智能与人文专题

赛博格、游牧主体性与生成-生命的新未来

——后人类理论视域下的科幻“主体性”书写与展望

王坤宇 程顺溪

摘要：科技正在全面介入人类日常生活，并对传统人文主义造成剧烈冲击，后人类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逐渐生成的文化新类型。其中，如何重新描述、定位和重构后人类的主体性成为重要议题。科幻文学作为推演和想象后人类社会的重要方法，与后人类理论一起构成了后人类文化生成的双螺旋结构。后人类理论围绕普遍生命力、游牧思维和自然-文化连续体等形成的游牧主体性理论新视域，对科幻文本塑造的以赛博格为代表的后人类形象的主体性新内涵具有较好的阐释力，即身体的具身化、意识的情动力与认同的横贯性，而这些要素正是作为生成-生命的后人类的核心和基本特征。

关键词：科幻；后人类；赛博格；主体性；生成-生命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现代理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就以别出心裁的“五幕校园假面剧”的形式，传达出了对彼时尚初见端倪的“后人类(Posthuman)”时代及其文化的预测与隐忧：“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人类形态——包括人类的欲望及其所有的外在表现——可能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必须重新审视之。当传统人文主义在将自身转变成成为某种我们只能无奈地称之为‘后人类主义’的新事物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五百年历史的传统人文主义可能正走向终结。”^①如果说彼时这仍囿于学理层面的推断和论析的话，那么近半世纪以后的今天，这一推论或已在很大程度上实

现在了当下的人类社会和全球生存中。如后人类理论家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所言，随着“作为后人类‘福音’四大骑士的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②等现代科技对人类及其所处星球的全面介入，不仅传统人文主义正烟消云散，人类本身也陷入了一个空前的“后人类困境”^③之中。

面对这一空前的时代困境及其波谲云诡

^① Ihab Hassan. "Prometheus as Performer: 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 *The Georgia review*, 1977, Vol.31, No.4, p.843.

^{②③} 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59, 1.

的未来,与传统人文主义的分崩离析乃至近乎失语相比,后人类理论和“主要讲述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过程”^①的科幻文学则展开了深入探索。聚焦于这一困境的根源——人本身的裂解、改变和重组,如何重新描述、定位和重构后人类时代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成为二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主体性问题与后人类困境不谋而合”,在布拉伊多蒂看来,其“令人困惑又不安”,并成为大多数后人类领域研究者关注的焦点。^②对人类主体性的困惑同样胶着于众多科幻作品中,一如批判后人类主义的开拓者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在分析了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等科幻作家的后人类书写后总结指出的,主体性问题是其“痴迷纠缠”的核心问题:“后人类还会保护我们在自由主体中继续看重的东西吗?或者从人类到后人类的转变要彻底毁灭这种主体吗……”^③如果要为这一系列围绕后人类主体性的发问找一个适切的承载者和体现者的话,或许非“赛博格”(Cyborg)莫属,作为科幻书写中极具症候性的后人类形象,其不仅处于“将人类与某种非人类的存在连接起来”的“后人类序列的核心”,^④同时也凝聚了科幻作家对后人类主体性的超前形构和多重想象。由此,以赛博格形象为结点,由后人类理论聚焦时代困境所构筑起的理论新视域切入,或可透视出科幻想象和塑造出的后人类主体性的新内涵,并为如何继续推进后人类时代的主体性书写作出进一步的理论展望。

一、后人类主体性的理论新视域： 从普遍生命力到游牧主体性

单从字面上看,很容易将后人类理解为诸如“后结构”“后信息”“后工业”等“追新逐异、令人厌倦的众多‘后’学之一”,^⑤忽视其对时代的深切剖析和理论探索。为此,布拉伊多蒂在《后人类知识》中再次强调了“后人类境况”的独特历史性与理论性内涵,并着重指出了其对于传统人文主义之根源的批判:“我所说的‘后人类’,既是指我们处境的历史性标识,也是指一种理论化的象喻……前者侧重于对以大写

的‘人’(Man)为普适性宇宙尺度的批判,后者则批判物种等级制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种特殊论。”^⑥在她看来,后人类涵括着对社会现实处境的回应和对理念认知的批判两个层面。前者指向科技全面介导时代的来临这一“历史性”时刻,与所谓的后现代状况相比,这一不断突破各类范畴和界线的时代境况的到来,从更为切实也基本的物质、生理、生命层面上全方位也深层激烈地击碎了传统人文主义的社会现实及其机制,并在全球维度上席卷开来;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对传统人文主义的“人”(Man)之理念及其人类中心主义建构展开进一步分析与批判,从而开启探究后人类主体性的理论新视域。

从批评的视角来看,传统人文主义包括三个层面的建构,首先是对“人”(Man)的理念和标准的建构,其次是在此前提下对“人”如何认知其所处世界的理念和模式的建构,也即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建构,第三则是对人所处的世界的建构,这三重建构之中,“人”是基础和根源。与之相对应,后人类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自身理论内容的阐述亦从此三个层面展开,首先展现为对当代境况下“何为人的共同参照系的基本单位”^⑦的探析,具体而言即提出了“普遍生命力”(Zoē)这一基源性的参照维度。据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分析,“希腊人并没有一个能单独表达我们所说的‘生命(Life)’之意义的词语。他们使用了两个虽然可以追溯到同一词源但却在语义学和字形学上截然不同的词语:zoē,表达了所有存在物(包

① 吴岩编:《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第2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②⑥ Rosi Braidotti, *Posthuman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p.47, 9.

③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第38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④ Bruce Clarke, Manuela Rossini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The Posthu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xiv.

⑤⑦ 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2, 1.

括动物、人或神)都有着生命这一共通的、简单明了的事实, *bios*, 则指向适用于个人或群体的生命方式或形态”^①。在此基础上, 后人类理论家弗朗西斯卡·费兰多(Francesca Ferrando)进一步分析指出, 传统人文主义之“人”的“生命”(Life)实际上立足于有机的/组织化的生命(*bios*), 而遮蔽、他者化乃至抹杀了普遍生命(*zoē*)。因而这一生命理念是“从属于‘人’而来的理念, 是人类为了在更大的图景中定位自我而创造的, 也是一个基于不断变化的特殊物种(人类)而特制的概念, 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中, 变化不已”^②, 其并非如现代知识理性所指认的那样, 具有不证自明的客观性和真理性, 更不具有先天或先验的合理性。正是在打破这一传统人文主义“人”之生命理念的基础上, 布拉伊多蒂一方面猛烈抨击其对生命的二元化等级建构并质疑其所划定的生命分界, 另一方面则鉴于当下科技的全面介导对生命概念和界线的不断冲击、逾越和拆解, 及其造成的混沌芜杂、多重交结的生命图景, 重新唤回了一直蕴藏在“人”之内并流动于整个星球乃至宇宙的普遍生命力(*Zoē*)。概而言之, 普遍生命力即指并非人类甚至有机生命所特有的、贯穿于所有物种及物质的、始源性和持续性的能量、活力和生命力之流。其内涵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它是物质性的、唯物论的, 并未重蹈传统人文主义形而上学理念化的覆辙, 正如布拉伊多蒂指出的, 普遍生命力“作为智慧生命力或者自组织能力的生命能量, 其并不局限于个体人类自我内在的反馈系统, 而是存在于所有生命物质之中”^③。在此意义上, 她又将普遍生命力总结为“唯物论的生命活力”^④。其次, 普遍生命力也是一种流动性和生成性的力量, “体现为持续性生成生命的无限活力”^⑤, 它流动在所有人类与非人类、有机与无机、自然与人工制品之间, 不断跨越和消解着传统人文主义理念划定的“生命”界线, 并将被隔离开的物种、范畴和领域重新连接起来, 既不断生成着各类新的生命形态, 也为“新的共同体、新的人性理念和伦理归属的重组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⑥。最后, 这一普遍生命力还是关联性和群体化的, 冲破了传统人文主义个体化本位的束缚, 甚至能够铺展到宇宙万物的层面。

它“代表着无意识的生命活力, 独立于理性的控制而存在”^⑦, 既促进了对生命万物的平等对待, 也将死亡涵括进来, 使之成为生命“生成能力和可能性极限”^⑧的标识, 进而“取代了生与死的截然两分”^⑨, 将传统人文主义个体化的、以死亡为终极的“人”的生命重置到了始源性的生命洪流中, 敦促个体生命更为自由、饱满也强烈地追逐、表达和实现自身。

将普遍生命力作为人的基本参照维度, 后人类理论不仅从物质基源上拆解了传统人文主义对于“人”(Man)和生命的建构, 还进一步改变了人认知世界的理念和方式。如果说传统人文主义的认知模式是一种本质化的、以现代知识理性为核心、以二元对立为方法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式的认知模式的话, 后人类理论则在普遍生命力的参照下, 引入了一种流动性的、整体性的、以关联性为先导、以生成性为核心的认知世界的新思维, 即布拉伊多蒂指出的游牧思维(Nomadic Thought)。这一思维源自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是其从游牧民这一具象的族群形态及其生存方式中提炼出来的一种思想理念, 其旨在摆脱所有传统人文主义的主体、理念、存在的规训和束缚, 将自身“置于持续流变的状态之中”^⑩, 进而呈现一种纯粹的、动态的生成能量与力量。布拉伊多蒂正是首先在此意义上引入了“游牧思维”, 亦即将“运动和流动性注入思考和思维的核心”^⑪, 继而指出其对现代知识理性的突破及唯物论的活力性, 其“是由感知、认知和想象组成的, 不能简化为人类的理性意识……以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

② Francesca Ferrando, *Philosophical Posthumani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9. p.110.

③④⑥⑧⑨ 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60, 66, 103, 131, 134.

⑤⑦ Rosi Braidotti, *Transpositions: On Nomadic Eth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p.41, 37.

⑩ [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 姜宇辉译, 第531页,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以下引文皆据此版, 不再具注。

⑪ Rosi Braidotti, *Nomadic Theory: The Portable Rosi Braidott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

一种唯物论的活力,将生命力投注到所有生命之上,甚至无机物之上”^①;随后她又强调了游牧思维的生成性力量,它不仅促使人类不断打破各类边界,真正进入世界本身,同时也使得人类自身的思想“产生创造性的飞跃,使头脑充满活力,照亮感官,并不断促生着个体自我与外在世界的横贯性连接”^②;由此,游牧思维最后也是一种以关联性为先导的思维方式,与德勒兹更注重“游牧”的流变性相比,它“更强调临界性和高密度的互联性”^③,更注重人与世界的基源性联结,并将此作为重新认知世界的基点。

如果说传统人文主义以自我与他者的辩证法建构出的世界是一个高度二元分裂的世界的话,那么其突出表现便是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而后人类状况的到来,则在整体层面上消解了这一对立。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面对当下不断增殖的杂合体(Hybrids)时所感叹的,“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自然,每天都在不断地重新组合并纠缠在一起”^④。后人类理论亦是在对此做出充分关切的前提下,以上述普遍生命力为参照,并通过游牧思维对这一世界图景作出了新的定位和描述——自然-文化连续体。在布拉伊多蒂看来,这一自然-文化连续体首先浮现于当下进展迅猛的前沿科技(如分子生物学、信息科技和认知科学等)对自然物与文化物之界线的模糊与消弭中,这些前沿科技不断逾越着生命与非生命、自然与人工、机器与智能之间的界线,并将这些对立范畴以空前的深度接合在了一起;其次,在此基础上,普遍生命力又坚韧且无所阻滞地贯穿了这一切,使之成为共通性的“有活力的、自组织的而又非自然本质化的结构体”^⑤,进而共同生成一种一元论的存在体;最后,当人类置身其中,并以普遍生命力观照和以游牧思维审视这一整体时,自然-文化连续体便应运而生,成为后人类理论重新理解人的主体性的“出发点”^⑥。也正是以此为基点,后人类理论最终生成了对后人类主体性的新定位:游牧主体性。

以普遍生命力为基源,后人类的游牧主体性首先是过程性和流动性的,而非本质化和同一性的,它铺展于普遍生命力的洪流之中,充满着唯物论的能量和活力,既跨越着学科、时空和

物种,又横贯着从非人类生命到无机物再到人工制品的所有“他者”,如海勒所言,它“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⑦;故而通过游牧思维,它又是关系性的,以关联为先导,以具身化的形态“根植于与众多非人类乃至星球的关联中”^⑧,嵌入整个自然-文化连续体中,进而也是肯定性和生成性的,通过根植于与整个世界高度联结和紧密通连的生命网络中,它既不断生成着自身,也推动着新世界的生成。而所有这些,都在科幻塑造出的赛博格形象中有着鲜明多重的体现。

二、赛博格的后人类主体性： 具身化、情动力与横贯的认同

据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的定义和分析,起源于信息学控制论(Cybernetic)对生物有机体和电子设备等机械人造物进行连接和重组的赛博格(Cyborg),其最突出的特征莫过于空前的“混杂性”了,作为一个“机器和有机体的理论化与组装/杜撰的混种”^⑨,它不仅结合了有机体和机器,还融贯了各种社会现实与理念虚构,以空前深度嵌入上述自然-文化连续体中。由此它展现出来的非本质和非同一的

①② Rosi Braidotti, *Nomadic Theory: The Portable Rosi Braidott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 3.

③ Rosi Braidotti, *Nomadic Subjects: Embodiment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5.

④ [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第2-3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⑤⑥ 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2, 82.

⑦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第5页。

⑧ Rosi Braidotti, *Posthuman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46.

⑨ [美]唐娜·哈拉威:《猿猴、赛伯格和女人:重新发明自然》,张君玫译,第245页,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哈拉威即哈拉维,赛伯格即赛博格,本文均采用学界通译:哈拉维与赛博格。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流动性、深度联通的关系性和多重持续的生成性,正高度契合了后人类的游牧主体性,并极具症候性地展现出了后人类主体性的新内涵,即身体的具身化(Embodiment)、意识的情动力(Affectivity)和认同的横贯性(Transversality)。

从科技史来看,作为赛博格创生之源的信息学控制论虽然通过将信息定义为“可以在不同材料的基质/载体之间循环,而且自身不被改变”的“实体”,^①打破了同为物质载体的人的身体与其他人工制品以及自然物的界线,但在对人的理解中,却将信息及对信息的处理视为本质和关键,而作为物质载体的身体,则被视为次要的、无意义的,甚至是可舍弃的障碍,由此其努力创建的赛博格自然极力排斥和消除身体,尤其是其具身性,并不断走向“虚拟身体”^②。有鉴于此,后人类理论在指出游牧主体性的流动性和生成性的同时,大力强调和突出其身体的具身化,“我所提倡的后人类主体性是唯物论活力论的,也是具身化和嵌入式的,它深切根植于某处”^③,正如布拉伊多蒂所言,后人类的主体性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是具身化的,其游牧思维同样也“强调具身化的理念,以及我们通常所说的思维的具体化和嵌入式的物质结构”^④,它“持续依靠(自然、社会、人类或技术的)环境而生存,同时也能不断地整合和生成这一系列的环境”^⑤。布拉伊多蒂由此进一步指出,具身化对于后人类主体性的意义并不仅局限于生物学层面或社会学范畴,更综合体现在“物质、象征和社会各个层面”^⑥,进而成为后人类真正的身体基源。在赛博格形象中,所有这些又都通过其对处境和语境的根植、对身体的唯物论与活力论的重现以及对感官认知的复敏^⑦全方位体现出来。迥异于控制论极力将生命“提炼”为抽象无形的信息,赛博格通过打破与众多“他者”的界线并与之连接贯通,深切嵌入和根植到了具体的生存处境和语境中。这并没有对它造成固化和限制,相反,凭借着蓬勃涌动的普遍生命力,它总是进行着“骚动且愉悦的紧密接合”^⑧,不断扩展、表达和实现着自身,进而展现出了唯物论身体的无限活力;此外,赛博格还以开放性和肯定性的姿态,将各类生物的、机械的和虚拟现实的义体或设备接入自身,进而获得了更强

大的身体机能,尤其是更精确、灵活和敏锐的感官认知能力。综上,与被概念化和普遍化的、只能被动承受话语规训的“身体”相比,赛博格展现出的根植性、具体化和充满活力的身体,无疑是一具具各不相同的“具身”,它们最终“取代了身体被当做心灵和心智的支持系统”^⑨。以此为基源,赛博格进一步展现出了远非现代知识理性所能涵括的独特主体意识。

如果说AI动摇了将智能作为人类意识的特质的话,那么后人类理论则进一步质疑将理性作为意识的绝对标准和核心内容,拆解理性/感性(情感)的二元建构,重新引入情感性因素,并将之作为后人类意识的核心要素之一。如布拉伊多蒂所言,作为一个更复杂的关系性主体,后人类主体被“具身化、性恋化、情感、同感以及欲望——这些核心品质所界定”^⑩。这些品质与理智有机融合,共同组成了别具新质的后人类主体性意识,体现在赛博格身上,即由情感、主动性和力量三个层面构成的“情动力”。就第一个层面而言,赛博格表现出来的情感,显然不同于传统人文主义理念中被理性所规训、压抑乃至极力排除的完全感性化的情感,相反,它是一种打破以自我为中心的、肯定性的同理心情感,同情与之相联结的万事万物,并对之有着理智的关切和理解;由此,赛博格的情动力意识也并不是盲目和失控的,被情感所裹挟,它并没有消解和弥散在所深植的世界中,而是有其主动性和能动性,指向着持续的行动和实践,并进而呈现出了它的第

①②⑨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第2、27、390页。

③⑤⑩ 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51、139、26.

④ Rosi Braidotti, *Nomadic Theory: The Portable Rosi Braidott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

⑥ Rosi Braidotti, *Nomadic Subjects: Embodiment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⑦ “复敏”原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术语,意为细胞或者生物体从脱敏中恢复过来,对激动剂的敏感性和反应性更为强劲,本文借用为对具身化赛博格更为强大的感官认知能力的概述。

⑧ [美]唐娜·哈拉威:《猿猴、赛伯格和女人:重新发明自然》,第248页。

三个层面,力量性。如果说传统人文主义的主体意识,即便是有力量指向(所谓意志力)的话,也往往都局限在心理和精神层面,赛博格的情动力意识则可通过众多先进的科技设备或通道“直接掌握过程,转化能量和力量”^①。将情感、主动性和力量以空前的形态结合在一起,赛博格体现出来的情动力意识既促使后人类的主体性成为一种“后意识的主体(性)”^②,也在根本上改变着其对于“自我”的认同。

据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解析,现代主体认同的形成建立在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之上,“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③,正是通过将“自我”的标准投射到众多他者之上,主体自我才得以建立起来。赛博格体现出来的主体性认同,首先从自我理念上打破了这一模式。以具身化形态根植于所处世界,并在普遍生命力的引导下与之动态性地共生在一起,赛博格极大地消解了传统人文主义主体认同中那个“自命不凡的、自私自利的、自恋和偏执的主体化自我”^④,进而生成也认可了一个更具活力的“扩展型的关系性‘自我’”^⑤。其次,这一“自我”不再划定出绝对和割裂的界线,进而拆解了现代主体认同中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使得赛博格的主体性认同贯穿了包括非人类生命、无机物、人工制品以及信息能量等所有的实体、范畴或理念,呈现出了极为开放和灵动的横贯性。最后,赛博格这一横贯的主体性认同还放逐了现代主体认同中纵向的进化论时间观叙事,不再诉诸一种无限延宕的、预设在未来的自我设定,而是不断谋求当下的、试验性和实践性的连接和联合,并在这部分性的接合中着意于横向的、持续的和充满差异的“自我”的生成。

三、理论展望： 走向生成-生命的新未来

综合来看,位于后人类理论提出的游牧主体性及赛博格体现出的后人类主体性之核心的,是一种生成(Becoming)。作为两者的根本维度和指向,生成既是普遍生命力、游牧思维和自然-文化连续体内在的基源性特征,也是赛博格

的具身化、情动力与横贯性认同的最终旨归,它将对主体性的思考引介到更本源的生命层面——德勒兹的生成本体论。在德勒兹看来,生成是生命的根本能量和力量,因为它总是引导着生命不断逃脱同一性的束缚和形塑,包括主体、存在和理念等所有范畴的禁锢,走向持续宏阔的宇宙性的差异之流,而正是这一纯粹的差异性流动开启了生命的旅程。具体到人的生成,德勒兹将其概述为向众多“他者”的生成,并重点指出了三种类型:生成-女人、生成-儿童和生成-动物,这些生成不仅打破了固有主体理念的束缚,甚至冲决了物质、社会和文化的网罗,向着纯粹的、差异化的、能量化的生命之流开放并不断生成着新的“自我”,因而具有无限可能性。^⑥借用和参照这一哲学观,布拉伊多蒂将后人类主体性的具体组建过程命名为“生成-动物、生成-地球和生成-机器”^⑦,指出在摒弃人类中心论的前提下,这一过程着重突出“作为非合一原则的差异”^⑧的主导作用,最终推动新的后人类“星球主体性的形构和生成”^⑨。

然而如若细审包括布拉伊多蒂在内的大多数后人类研究者的主体性理论,则会发现,其虽然一再强调对传统人文主义理念的批判与摒弃,但对新主体性的构想却始终未能超越一点,那就是仍以人类自身为支点和出发点,尽管不再以人类为中心和标准。这在布拉伊多蒂的阐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她自己所言,在阐释后人类主体性的过程中,“不可能在知识和伦理上将(传统)人文主义的积极成分同问题成分分离开来”^⑩,因此她再次将责任感和道德感等纳入进来,积极倡导一种新的“游牧伦理”和“肯定性政治”。^⑪从社会实践层面上看,这无疑有其合理性,但回到本体论层面,其却再次限制了在纯粹生命生成视域下对后人类主体性的

①④⑤⑦⑧⑨⑩⑪ 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139, 138, 60, 66, 95, 104, 30, 47.

②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第380页。

③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第5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⑥ 参见[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384-389页。

探索。这一局限性同样体现在德勒兹的生成本体论中,虽然在普泛抽象的意义上将生成推至宇宙万物层面,但在对生成及人的生成的具体解析中,德勒兹仍未脱出以人本身为支点,将生成-女人视为“所有生成的根本和关键”^①,而对于那些非人类的生成,则仅以“生成-难以感知”^②概述之。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超越这一局限的前提下,将上述德勒兹的生成本体论与基源性的普遍生命力结合起来,以形成一个新的、摆脱了以人类为支点和出发点的、更普泛也具有更多生成可能性的生命视野——生成-生命的视野,并由此出发,将赛博格体现出的“主体性”拓展到广阔的、非人类的生命乃至物质的生成之上,对如何继续推进后人类时代主体性的想象与书写作出进一步的理论展望。

首先就赛博格体现出的具身化而言,那些生成-生命的具身又是何种形态呢?要记住,这里的具身不是普泛意义上的外形或躯体,这很容易从物质或生理层面作出描述,而是一种置身于世界之中的、切实的生存感受与生活状态,那么假如它们还具有有形的、物质的躯体的话,它们是如何生存于所处的环境与世界之中的呢?它们躯体又展现出了怎样的活力呢?是唯物论的活力,还是其他更独特多样的活力?此外它们又具有怎样的感官认知呢?正如人工智能界一直力图赋予机器以人类的具身化能力一样,本文也期待科幻在接下来的后人类书写中,能够切实切“身”地呈现出那属于生成-生命自身的具身化内涵;其次这些生成-生命又具有怎样的意识呢?与赛博格的情动力意识相比,它们的意识构成会更复杂吗?它们的情感会更淡漠疏离还是会更密切交融?它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会更敏锐强烈还是更分散低落,或者在这之间变换不已?再者,它们的意识能量会更强大、更外在、更具有行动性和实践性吗?还是所有这些都不确切,它们的意识更为独特,且千差万别?正如人工智能界一直未能将人类的复杂情感和意识赋予AI一样,那些独属于生成-生命自身的意识情态,也尚未得到充分想

象和书写。最后,这些“生成-生命”又是如何认知和对待“自我”的呢,假如它们有“自我意识”的话?它们的“主体性”认同是像赛博格那样横贯了众多“他者”吗?还是横贯的范围和时空更广大?或者遗世而独立,绝缘于一切?或者同样在这之间不断变换?抑或有着更为独特的认同取向或对象?由此它们又会形成怎样的伦理和道德?基于这些伦理道德,它们又生成了怎样的社会和文明图景?所有这些都作为无数种外在于人类本身的“外部主体性”,呼唤也等待着科幻在后续的主体性书写中展开更具生成性的想象与描绘。

从这个意义上讲,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的《索拉里斯星》或仍是一个重要参照,其中那个作为生命-智慧体的索拉里斯-海洋,虽将其物质性的外表和构成无所隐藏地展现给了人类,但却仍以其物化和具现人类头脑中思维和欲念的神秘能力,以及对人类所有探测和试验的诡异反应方式,牢固地宣示了自身外在于人类的本体性,以及作为一个切实的“外部存在”而存在。^③期待我们的科幻在接下来对众多非人类生命的书写中,在展现出其这一“外部存在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引入赛博格体现出来的主体性维度,真正从这些生命自身之内和之上描绘出其“主体性”,进而想象和描绘出一个崭新的未来,一个生成-生命的未来。

【作者简介】王坤宇,集美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媒介、后人类文化与美学;程顺溪,苏州工学院学术期刊编辑中心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科幻文学。

① 陈永国编译:《游牧思想》,第10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② [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第354页。

③ 参见[波兰]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索拉里斯星》,陈春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